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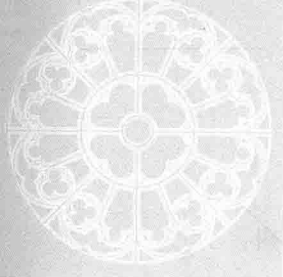
东吴史学文丛
丛书主编 王卫平 池子华

明清社会与经济 近代转型研究

余同元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东吴史学文丛
丛书主编 王卫平 池子华

明清江云与经济 近代转型研究

余同元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社会与经济近代转型研究 / 余同元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5. 9
(东吴史学文丛 / 王卫平, 池子华主编)
ISBN 978-7-5672-0814-8

I. ①明… II. ①余… III. ①社会发展史—研究—中
国—明清时代②经济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K248.07②F1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1005 号

明清社会与经济近代转型研究

余同元 著

责任编辑 盛 莉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东兴路 7-1 号 邮编: 215021)

开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21 字数 400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0814-8 定价: 44.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总 序

苏州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其前身为创建于 1900 年的东吴大学。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等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 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苏州大学。迄今为止,苏州大学已是一所拥有 6 个校区、113 年办学历史的著名高校。

历史学是苏州大学的传统学科之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东吴大学时期。1952 年江苏师范学院成立之初,设历史专修科;1955 年,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史学家柴德赓教授受命南下,创建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

“文革”结束以后,历史系在学科建设、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均取得长足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史中的太平天国史、江南社会经济史等逐步成为历史系的特色研究领域,出版了《太平天国在苏州》《左宗棠评传》《苏州手工业史》《六朝史》等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世界史教师也通力合作,先后编写了《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等系列教材,在高校历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继 1983 年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成功申报硕士点后,1991 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并于 1994 年正式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93 年以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还被江苏省政府列为重点建设学科。1995 年,结合苏州大学院系调整,历史系更名为社会学院。

现在的社会学院包含了 5 个系 8 个本科专业,而历史学系无疑居于龙头地位。进入 21 世纪以后,苏州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更为明显,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2005 年,历史学被评为一级学科硕士点;2007 年,获评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8 年,历史学专业成为江苏省品牌专业,中国古代史获评江苏省精品课程;2010 年,历史学被评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后因一级学科的变化,调整为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点。与此相应,中国史成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而历史学科教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每年均有斩获,成为科研中的一个亮点。

从“九五”时期开始,历史学科即参与苏州大学“211 工程”建设项目,并作出了积极贡献,先后出版了“苏南发展研究丛书”、“苏南历史与社会研究丛

书”、“吴文化研究丛书”等系列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我们积极落实学校“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努力服务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各级政府部门既提供了有效的决策咨询服务,又承担了多项大型文化工程的建设任务,如:《苏州通史》(编纂)、“苏州文献丛书”(古籍整理)等;还构建了“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江苏省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等重要科研平台。所有这些,都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州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源于长期办学的深厚积累,得益于学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关心和支持,更是与广大教师的辛勤耕耘、努力工作分不开的。为此,2012年9月,经历史学科诸同仁的充分商讨并得到社会学院的同意,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东吴史学文丛”。“东吴史学文丛”收录了我校历史学科多位在职教授的研究成果,每位教授的成果单独成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位教授的成长历程和治学特色。

在“东吴史学文丛”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王玉贵教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苏州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各书稿责任编辑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王卫平

2013年春节

江南结构转型与江南道路蹊径别生 ——代前言

书中选取五十岁前旧作 16 篇,列上、中、下三编而成一集,旨在温故知新也。

上编冠以“明清社会的近代转型”之名,收录《明清社会近代转型及转型障碍》《传统工业行业分化与明清工匠职业分工的发展》《传统工匠及其现代转型界说》《明末清初的社会震荡与文化变奏》《清末历史发展中的时代共性与民族个性》五篇,主要讨论明清社会转型的表现、途径、性质及相关问题。

其中,《明清社会近代转型及转型障碍》^{〔1〕}一文,论述明清社会转型的研究范式和明清社会近代转型开始的时间标志,同时讨论明清社会近代转型的要素、过程、表现和障碍。认为从明代隆庆年间开始,以“边禁”“海禁”“银禁”等三禁开放为标志的中国传统社会近代转型进程已正式开启。江南区域已经出现从农业时代向早期工业化时代转型,从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向半自给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半封闭兼开放和全球化社会转型的趋势。整个转型之所以在清代曲折迂回,端在障碍众多,关键原因来自于当时内外环境的特殊性和农牧社会融合的缓慢性。

《传统工业行业分化与明清工匠职业分工的发展》^{〔2〕}一文,在通览中国历史时期手工业行业、职业与工种演化的基础上,重点通过对明清江南地区工业行业与职业工种的数量、类型、规模及其变化特征的论述,来认识明清江南地区工业行业分化与职业分工的发展脉络,并借以说明传统工匠职业分工是与传统工业行业分化密切相关的一体两面的历史运动,行业分化与职业分工彼此互动、相辅相成,体现了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中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的高度发达,构成了江南区域早期工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传统工匠及其现代转型界说》^{〔3〕}一文,对“工匠”“传统工匠”“传统工匠

〔1〕 余同元:《明清社会近代转型及转型障碍》,《江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3期第161页摘要介绍。

〔2〕 余同元:《传统工业行业分化与明清工匠职业分工的发展》,《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

〔3〕 余同元:《传统工匠及其现代转型界说》,《史林》2005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2005年第6期全文转载。

现代转型”等概念和范畴加以界定。认为中国历史上作为传统工业技术主体的工匠,可分为上(“巧匠”“哲匠”等科技专家)、中(专业技术化与职业化的“匠人”与“匠师”)、下(“百工”“工人”等熟练工人)三个技术层次;其现代转型包括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两方面内容,既是传统工匠向现代技术工人、科技专家转型中科技主体的身份地位转化和职业角色转换的双轨式发展过程,又是现代区域发展中人力资源开发的动力过程,还是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与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核心标志。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工业史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传统工业生产者——工匠的历史研究成果却很少。特别是关于“工匠”与“传统工匠”的基本定义问题,存在着简单化和模糊化倾向,缺少专门讨论。定义是逻辑推理的前提,也是理论思考的基础,只有前提和基础一致,“传统工匠”历史研究才有学术意义。

《明末清初的社会震荡与文化变奏》^{〔1〕}一文,概述《崇祯十七年:1644年中国社会震荡与文化变奏》一书的基本内容和写作思路。同时论述明末清初社会震荡与文化变奏的内在关系及其推动当时社会转型的历史影响。认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北部边疆问题与农、牧民族矛盾的问题,在明清王朝鼎革之际发生了重要变化;以社会大分化、大冲突和大整合为主要内涵的剧烈的社会运动始终与长城内外农、牧社会文化二元一体化的民族运动彼此互动,使文化转向与社会转型因素同步增长,达到了将中国传统社会导向近世社会的新起点。但专制与反专制的较量势难分晓,以暴易暴的革命途径与成败相因理不常泰却依然故我。

《清末历史发展中的时代共性与民族个性》^{〔2〕}一文,概述光绪(1875—1908年)、宣统(1909—1911年)两朝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认为其时正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统治走向覆灭的末世期(泛称“清末”),又是中国社会近代化(亦称“现代化”或“早期现代化”)转型中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坍塌和重建的关键期(亦称转型的“瓶颈期”),还是整个世界历史发生时代性重大转变的质变期——英、法、德、美、俄、日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动,世界历史已经步入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自秦汉以来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和自宋明以来千年的反专制斗争,

〔1〕 余同元:《明末清初的社会震荡与文化变奏》,原为《崇祯十七年》再版自序。《崇祯十七年》已多次再版,该序是该书2002年于台湾老古文化出版社再版时所作,曾提交在武夷山召开的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讨论,收入《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2〕 余同元:《清末历史发展中的时代共性与民族个性》,原为《〈清代通史·光绪宣统卷〉绪论》,该文曾提交第11届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交流讨论。《清朝通史·光绪宣统卷》是朱诚如主编的大型《清朝通史》的第十三册,2003年于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以及改朝换代历史的治乱分合与成败循环之定势,到了清末民初,一起淹没于“走向共和”的强大呼声之中。

中编冠以“长城文化带演变与农牧社会二元一体化”之名,收录《论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的二元一体化发展》《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明代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明代马市市场考》《清代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发展的途径与标志——兼说“走西口”“跑口外”与“闯关东”的历史内涵》五篇。主要论述明清长城文化带的演变和农牧经济社会的二元一体化过程,探讨中国传统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与地缘文化的近代转型。

其中,《论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的二元一体化发展》^{〔1〕}一文,论述中国历史时期农、牧民族的二元一体化原因、过程和影响等相关问题,认为历史时期中国长城两边农、牧经济、民族及社会的二元一体化,以历代塞外游牧人口的南移和中原农耕人口的北移及农、牧人口的叠移为前提,以农、牧民族的经济共生关系特别是民间自由贸易关系的发展为动因,以历代长城文化带的演变,尤其是它的过渡功能和内边疆形态的变化为脉络,以明末长城地带民族贸易市场的兴盛和清代满汉的政策的确行为标志,既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核心内容,也是历史时期整个亚欧大陆农牧世界二元一体化的历史缩影。

《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2〕}一文,认为中国历史上,长城既是中原王朝的边防线,又是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线,既是农、牧经济的自然分界线,又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汇聚线。从周秦到明代,有20多个诸侯国和王朝修筑长城,将历代所修长城的长度加起来,超过十万里。每个朝代长城的修筑都标志着一条特殊的文化带兴起,也都是长城文化带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在每个发展阶段中长城文化带的演变都体现了长城地带经济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揭示了其同内地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明代构筑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道长城,它位于历代长城的最南边。沿着这道长城,以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又称三关镇或太原镇)、延绥(又称榆林镇)、宁夏、固原、甘肃等九大军事重镇为中心的九边地区是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大致范围。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是周秦以降长城地带特殊的政治、经济发展之总结,也是中国长城文化带发展的最后定形。其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洪武开国至土木之变(1368—1449年),以发展战争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生产型文化带形成和发展阶段。第二,土木之变到隆庆和

〔1〕 余同元:《论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的二元一体化》,《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9年第10期摘要介绍。

〔2〕 余同元:《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烟台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年第8期全文转载。

议(1449—1517年),以经济战争消耗为主的消费型文化带兴起和发展阶段。第三,隆庆和议到崇祯失国(1517—1644年),以民族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交换型文化带形成和发展阶段。

《明代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1〕}一文,对明代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兴起的过程、表现、性质及影响进行系统讨论。认为秦、汉以来长城两边经济、文化分合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这两个区域及两个社会之间,必然有某种贸易的存在,以体现其根本的经济共生关系。长城沿线农、牧民族的和平互市贸易在明代以前便已萌生,但真正能够于和平环境中实现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则是明后期明、蒙通贡互市以后的事。以隆庆和议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分别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正统年间(1436—1449年)和嘉靖年间(1522—1566年)开放市场,以官办的朝贡贸易为主;后一时期马市性质发生变化,由朝贡贸易发展为自由贸易,官市过渡到民市,在更大规模的民族贸易市场上,民间自相往来、有无互通的贸易占据主导地位。隆庆和议以后,长城沿线“华夷兼利”的民族贸易市场普遍建立并历五六十年盛而不衰,才使农、牧民族贸易乃至全部的民族关系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明代马市市场考》^{〔2〕}一文,对明代长城地带50余处马市市场的设置、分布与市易情况进行考证性研究。因马市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马市市场的名称也形形色色,或称“关市”“通市”“互市”,或称“大市”“月市”“小市”,或称“官市”“私市”“民市”,或称“茶市”“木市”等。这些称呼包括了各个时期各个地区不同类型的马市市场。这些市场到底有多少,它们是怎样开设的,又是如何分布的,以及它们各自的贸易对象和贸易内容、贸易特点等问题,都是需要一一澄清的大问题。本文考证后认为,明代后期长城沿线九边地区,具备市规市法和市易功能的明代马市市场近70个,其中可详考的50余个;这些市场的兴盛使明代农、牧民族之间的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使长城文化带发展成为农牧交换型“半农半牧带”,从而推动了长城文化带发挥地带过渡功能,渐成“农牧过渡带”,大大促进了长城两边农、牧经济和文化的二元一体化。

《清代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发展的途径与标志——兼说“走西口”“跑口外”与“闯关东”的历史内涵》^{〔3〕}一文,对清代中原农耕人口北移进入内蒙古地区(以归化城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的移民垦殖为主)的移民史进行系统梳理,并以清代内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迁入过程和影响为讨论重点,深入探讨晚清时期长城内外农牧民族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二元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清代

〔1〕 余同元:《明代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2〕 余同元:《明代马市市场考》,《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3〕 余同元、王来刚:《清代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发展的途径与标志——兼说“走西口”“跑口外”与“闯关东”的历史内涵》,《西北民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大量中原汉族移民通过“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等途径迁入内蒙古等北部边疆地区。其中,移往内蒙古东部的昭乌达、卓索图、哲里木等地的主要是山东、直隶、河南等地人民,历史上称为“闯关东”;迁往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的主要是直隶、山西等地人民,称“跑口外”;迁往内蒙古西部的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等地的主要是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地人民,称“走西口”。认为正是“走西口”“跑口外”与“闯关东”三大历史运动,实现了近代中国边疆与内地的全面大融合。

下编冠以“江南早期工业化及近代技术经济兴起”之名,收录《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江南产业技术理论化的差异性与关联性研究》《明清江南织布技术的理论化——以清代三部〈布经〉为例》《清代技术经济史发微——关于〈匠作则例〉之技术标准化及其产业经济效应研究》四篇,主要讨论明清江南区域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江南传统产业技术理论化的表现及近代技术经济的产生问题。

其中,《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1〕}一文,专门以传统的江南工业,特别是明清江南区域支柱产业中从业人数增长为关键指标,分期估算明中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增长情况,论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发展的时间和标志,以与学界论述早期工业化的诸方名家相呼应。中国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何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本文认为明代中期以后,江南纺织业等传统支柱产业从业人数空前增加,清中期以后江南工业更为发达,从业人员也更加众多。根据传统工业从业人口增长这一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标准,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说明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

《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江南产业技术理论化的差异性与关联性研究》一文,对明清江南及其周边地区 200 多种工业科技文献的生成及其作者、版本、内容等进行分期分类研究,梳理其技术理论化内涵,分析其技术科学化的意义,并讨论江南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时期技术理论化的外在差异性和内在关联性。强调从科学技术驱动区域工业化的角度看,江南早期工业化过程与工业现代化过程,本质上就是技术科学化过程和科学技术化过程,旨在揭示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内在脉络。认为产业技术理论化主要指江南及其周边地区传统工业技术由经验形态向理论形态的转变过程,它以传统工业文献的形成及其科学内涵的增长为主要标志。

〔1〕 余同元:《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史学月刊》2007 年第 11 期。

《明清江南织布技术的理论化——以清代三部〈布经〉为例》^{〔1〕}一文,介绍清代流行于江南的三部《布经》内容体例,分别论述其文本化过程及其所体现的织布技术理论化特点。这三部《布经》分别是山西商人范铜编著的八卷本《布经》和徽商编写的两本《布经》。各地商人到江南地区经营棉布生意,在长期的返销过程中,在辨别棉布优劣、染色好坏方面积累了系列经验,为了能更好地收购和贩卖棉布,他们便把这些经验编成书籍,供学徒们学习。从三部《布经》的内容看,可以确定成书年代在乾隆时期,更加重要的是,书中用数量来表示颜料的搭配比例,对布的各要素均做了详细的定义,这些量化标准都是当时同类书中所未有的。

《清代技术经济史发微——关于〈匠作则例〉之技术标准化及其产业经济效应研究》^{〔2〕}一文,以清代《匠作则例》的技术标准化及其产业经济效应为例,来研究清代技术经济的兴起。乾隆以后,清朝各部院衙门编纂则例日益普遍,各部院下属机构乃至地方政府也纷纷编制各类技术则例,如《工部则例》《内务府则例》《宗人府则例》《光禄寺则例》《太常寺则例》《军器则例》等,保存下来的清代则例种类繁多,数量丰富,是清代技术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它体现了传统产业技术理论化与标准化的发展,以及这种理论标准的经济实践作用。清代各种国家技术则例在江南地区推广使用,内容日渐完备,是江南近代技术经济兴起的重要条件。

另附有《醍醐海阔、德性山高》《做学问先学做人》^{〔3〕}两篇,总结本人本科及硕士研究生阶段习研明清史之经历,兼述业师张海鹏先生及当年诸多恩师之教益。限于篇幅,论文选集不能收入《明清江南地缘结构转型及江南近代技术经济兴起》等论文。为了弥补,这里借前言之地,谨以《江南结构转型与江南道路蹊径别生》为题,概要叙述明清江南地缘结构之变化与近代技术经济之兴起,以使全书内容略成体系。

一、西北到东南区位变局与明清江南地缘结构之转型

顺治皇帝所说“万里江山一局棋”,与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所说“大棋局”意义相近。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1〕 余同元、黄康健:《明清江南织布技术的理论化——以清代三部〈布经〉为例》,《故宫学刊》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2〕 余同元、何伟:《清代技术经济史发微——关于〈匠作则例〉之技术标准化及其产业经济效应研究》,《明清论丛》第13辑,紫禁城出版社,2012年。该文于2011年9月提交北京“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暨第十四届清史国际研讨会”。

〔3〕 余同元:《醍醐海阔、德性山高——张海鹏教授与明清史研究》,日本《明代史研究》2002年第30号;《做学问先学做人——张海鹏先生门下尊教记》,《张海鹏先生诞辰80周年暨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

说明中国自古有着东南区域和西北区域的地缘差别。宋元以前,西北中国是前庭,东南中国是后院。明代“边禁”“银禁”与“海禁”开放以后,东南中国由“后院”变成“前庭”,中国地缘战略开始发生近代转型。^{〔1〕} 地缘是由地理位置联系而形成的系列关系。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位置为纽带而形成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交往而产生的区域社会关系。明清江南地缘关系及江南的空间范围划分,不仅反映了江南区域率先开启社会经济近代转型的地域特征,而且也反映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以来,由于政治重心与经济、文化重心的分离,其帝国基石地位和分权制约的枢纽作用日益提高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地理因素是影响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因素。最大的国家战略实质上是地缘政治的协调,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近现代边防的根本问题是确保陆权,海防的根本问题是发展海权。一旦边防危机与海防危机同时爆发,国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使其不能二者兼顾,必须正确处理确保陆权与发展海权的协同关系。无论是从中国《孙子兵法》还是西方的陆权海权理论看,地缘政治关系始终是战略地理学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因素。明清江南地缘结构与空间范围的变化反映了当时地缘政治变化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机遇。下面首先分析明清时期地缘政治江南、地缘经济江南和地缘文化江南的战略地位和地缘结构变化情况。

先看西北中国到东南中国区位变局下的“战略江南”。

中国版图兼有南农北牧两大区域,历代长城内外对峙,农牧民族分合,正是欧亚大陆农牧世界二元一体化的历史缩影。自秦汉至宋元,中国边防主要在北边。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庭院,宋元以前这个院子的大门朝北开,因为影响中国农业民族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历代中原王朝所谓的“边防”主要指万里长城沿线的防御情况,其内容包括北部的边患和战略防御、边防部署、长城修筑与驻兵战守等活动,形成了著名的“长城文化带”。^{〔2〕} 但至明初,开始构筑海防体系,永乐至宣德年间进一步完善海防设施。海上防线由水军担任,陆上防线由陆军担任。沿边、沿海各卫所分别负责防守一定地域,并彼此呼应,连成一片,构成基本完整的、有纵深有层次的防御体系。在这个强大防御体系生成过程中,中国东南海防地位日益提升,迅速发展并超过西北边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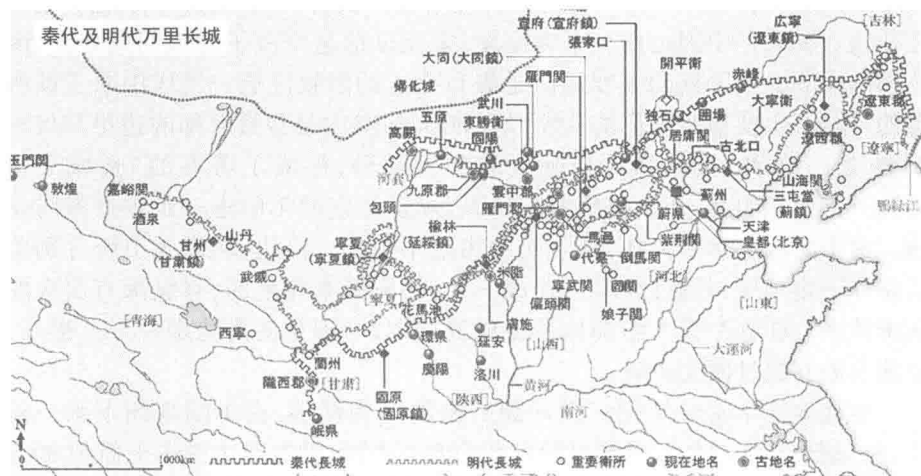
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漠河到云南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画一斜线,称“胡焕庸人口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 60% 左右的土地和占总人数 5% 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 40% 左右的土地和

〔1〕 余同元:《明清社会近代转型及转型障碍》,《江南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

〔2〕 余同元:《中国长城文化带的演变》,《崇祯十七年》,台湾老古出版社,2002 年,第 477—484 页。

占总人口数 95% 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耕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之所以长期出现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这种二元区域双轨发展的局面,是因为中国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

打开世界地图,由东起东北亚的大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向西直至欧洲境内的喀尔巴阡山画一横线,将亚欧大陆区划为南北两部分:横线以南多为湿润的平原森林地带,宜于农耕,其中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等都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农耕中心。横线以北多为干燥的高原荒漠地区,与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西伯尼亚经中国东北、蒙古高原、中亚、咸海、里海以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带,其核心地区是蒙古高原至中亚一带。农牧分界线划分的方法略有不同,台湾三民书局 1982 年版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以亚洲东北部的堪察加半岛尖端与阿拉伯半岛西端相连接画一直线。台湾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札奇斯钦《蒙古文化概说》云:“自东北亚洲大陆的嫩江、松花江流域,沿长城线,经西藏高原,伸向阿拉伯半岛画一条线。”这条线正好横穿中国,将中国分为西北中国和东南中国两部分。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时有迁移,与历代长城位置的移动基本同步,反映了自然的农牧过渡带与人文的长城文化带之变迁特点。^{〔1〕}明代长城文化带进一步南移,农牧民族二元一体化进程加速,到隆庆五年“俺答封贡”,边禁开放,长城文化带由“内边疆”形态变成了巨型民族贸易带。^{〔2〕}



秦代及明代万里长城图〔3〕

〔1〕 余同元:《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烟台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2〕 余同元:《论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的二元一体化》,《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3〕 安介生:《走进中国名关》,长春出版社,2007年。

15 世纪中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封建主和寺院大地主为扩充实力,弥补内战损失,怂恿、支持海盗活动,因而倭寇逐渐猖獗。嘉靖年间,明廷内政日趋腐败,倭寇乘机与少数奸商相勾结,窜犯今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占据岛屿,攻城略地,深入久踞。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沿海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成为明朝的严重祸患。沿海民众不堪倭寇侵略,奋起抗击。戚继光指挥军民与倭寇水陆交战十余次,取得重大胜利。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开始,明政府全面整治海防。编绘了《筹海图编》的郑若曾又编绘《长江防御图》与《太湖防御图》。他写出《江南经略》,包括 46 幅《江防图》和 29 幅《湖防图》,这些地图是明代江南江河湖泊战备图的代表。其中所绘《江防图》的范围主要为长江下游,西起今江西瑞昌,沿江而下,东到长江口的金山卫,这个范围也是倭寇进犯可能到达的地方。图上重点描述江防设施、哨所驻地、各营防区范围及其界线、倭寇出没路线等。图上注记文字较多,除了地名、山名、港名、寺名之外,还标注了防区的起止地点,不同巡司间的距离,巡逻水军的兵员多少、舰只数量、巡逻周期等。太湖是倭寇从水路容易进犯的地区,《江南经略》中绘制的《湖防图》,有大的《太湖全图》和 28 幅小的《太湖沿边设备之图》,分别描绘了太湖的全景和沿太湖周边的港渚及其防备情况,共有港渚等约 250 处。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在海防发展的基础上还出现了很多海防理论著作,如《筹海图编》《筹海重编》《虔台倭纂》《皇明海防纂要》等。自海防地位日益提升,中国地缘战略发生整体转型,过去作为后院的东南沿海地区,现在变成了中国的前庭门户。



明代郑若增海防图〔1〕

〔1〕《万里海防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曰：

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春秋时勾吴实雄长于东南，以兵威破楚、臣越、败齐，又阨深沟于商鲁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当是时，微越之故，吴且霸天下。……或者曰：明太祖以江南而奄有中原，为千古创见之局。此实不然，从来建事功者，得失虽殊，成亏或异，而其能法非以有为则一也。楚南公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故西北与东南恒有互为屈伸之理。^{〔1〕}

综观明清西北边防与东南海防关系史，发生了多重的变化。

一是前庭与后院的关系：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由后院变为前庭和门户。

二是陆权与海权的关系：郑和下西洋、皇明筹海、海权时代开启。

三是守成与开拓的关系：洋防与岸防，战略防守与战略出击。

四是守内与御外的关系：明代防入与清代防出。

五是重中之急与急中之重的关系：晚清塞防与海防之争。

其次看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下的“财富江南”。

中国之一统，多指南、北方之统一。统一国家大多定都于北方之北京，而以南方之南京为陪都，形成一个南北向的政治、经济、文化轴心带，这是经济中心南移导致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带变换之大势。宋元以降，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了，政治中心却不能随之南迁，统一王朝由西向东，由长安而洛阳而开封而北京逐渐移动，可以出现以北京为主、南京为辅的两京制度，却难以出现以北京为辅、南京为主的两京局面。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历代统一王朝时期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现象。

北宋末，赵构重建宋室社稷，李纲建议：“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2〕}后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汪若海对张浚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3〕}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汉和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

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问割据；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故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是时地气将自西北趋东，此正地气自西趋东北之真消息，

〔1〕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十九，中华书局，1957年。

〔2〕 《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

〔3〕 《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特以气虽东北趋而尚未尽结,故仅有幽、蓟,而不能统一中原。而气之东北趋者,则有洛阳、汴梁为之迤迤潜引,如堪輿家所谓过峡者。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元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集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1〕

至明清时期,不仅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皆移至江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海上侵略势力到来和东南海防的日益重要,国家战略重心也向东南转移。对此,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提出了著名的“建都之问”:

或问: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

……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围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闯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认为明清时期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首都应该建于南京而不是北京,这样才能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统一起来。黄宗羲的观点是否正确?揆诸明清史实,“门庭”与“仓库”已然转型换位,建都的战略反思尤为必要。

元代以江南地区为主要经济掠夺对象,导致《草木子·克谨篇》所说的“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或“贫极江南,足实塞北,富极腹里”的极端不均现象。13世纪后半叶,进入中原和南部中国的蒙古人口,最多不会超过七八十万,而当时居住在宋、金旧土的汉族人口大约有7000多万(不包括云南和吐蕃之地的人口数)。《元史·食货志》云:京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在中书省和九个行省中,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广)每年所征税粮近六百五十万石,占全国总数二分之一强,而江浙一省就征近四百五十万石,占全国总数三分之一多。元末农民义军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作为宣传口号,表达了江南人民对于民族掠夺的愤恨之情。至元二十年,各地大小起义200余处,至元二十六年就增加到400多处,几乎南方各地都有起义发生。

黄宗羲《建都篇》又曰:

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

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

〔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

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犹富室之有仓库匱篋也。

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匱篋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匱篋。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

历史时期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元末明初的周(张士诚)和清太平天国等。但皆是祚长命短,更加说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长期性。明代学者李乐、张萱均有论说。“国朝定鼎金陵,本兴王之地,然江南形势终不能控制西北。”〔1〕“南京之形势跨江南北,以为甸服。岷峨以西,五岭以北,川流以万数,皆会于江,绕钟山而之海;岍岐之南,太华恒岳之间,川流亦以万数,皆会于河,入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无事则坐享扬越之粟而无转输之劳,有事则席卷全吴之甲而为张皇之本,故正统间有建议南迁者。殊不知以天下大势观之,终不若燕京之胜,而今日都之诚是也。”〔2〕

第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还是统一?或者问为什么分离?

第二,政治中心是否随经济中心迁移?或者人臣能否替代天子守边?

第三,所谓“时不同”有哪些主要表现?“明清江南”地缘结构如何?

第四,金陵能否重新成为首都之佳选?或者江南能否成为真正的政治中心?

第五,如何避免再度“贫极江南、富夸塞北”?如何处理中国前庭与后院的关系?

再看闭关到国际开放中的“枢纽江南”。

邹逸麟先生《谈历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3〕一文,论江南地区历代政治地位变迁,分“中原王朝心目中的异域地区”“南北对峙:江南为另一政治中心”“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江南”三大阶段。这里重点讨论明清“江南”国际枢纽地位的形成。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了世界“地理中心(枢纽)”概念,也就是“世界岛”理论。即:谁统治了东欧平原,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全世界。如果将明清中国比作一个“孤岛”,那么这个岛的“心脏”无疑就是地缘江南,即上文所谓的“中国的心房”。它的空间形态虽在南方,但它的政治、经济、文化要素早已开始国际化和全球化,并通过空间的层级的互动与北方的宫廷联为一体。整个明清时期,由于“海禁”政策时作时息,使江南的国际化进程受到较大影响。但自明中期“银禁”“海禁”“边禁”等“三禁开放”后,江南

〔1〕 李乐:《见闻杂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9页。

〔2〕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十二《兵部十一》,民国哈佛燕京学社印本。

〔3〕 邹逸麟:《谈历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浙江学刊》2010年第2期。